

女性何以占领时间银行：我国时间银行 志愿者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熊伊伊 王黎 陈功*

摘要：性别差异是时间银行志愿者的重要社会特征，体现了时间银行在第三次分配中社会资源的供给。本文应用混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 230 名时间银行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和对北京市东城区某时间银行的 22 位机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发现女性志愿者在我国时间银行中占优势地位，具体体现为女性志愿者的数量和占比多于男性志愿者，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参与程度比男性更高。此外，女性志愿者和男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倾向于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女性在时间银行中比男性更可能提供社区公益服务。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可以从助人行为的性别倾向、职业发展补偿和挑战公共领域的男性主导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关键词：时间银行 女性志愿者 志愿服务参与

* [作者简介] 熊伊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黎，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功（通讯作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时间银行创新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3ZDA101；主持人：陈功）。本文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子言同学在资料收集方面的贡献。

引言

1980年，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提出了“时间银行”概念，倡导“时间美元”并将其作为一种“社区货币”。卡恩提出合作共产的价值观念并将其作为时间银行的理论指导，其中“互惠”是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强调由过去的“你需要我”变成“我们需要彼此”。在这种模式下，时间银行将“时间”和“公益”挂钩，倡导社区成员积极利用闲散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把所付出的时间以虚拟货币化的形式存储起来，当自己有需要时从中支取“已存储时间”。当前时间银行在我国正经历着飞速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很多继承了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的沉痾，如第三次分配的社会资源统筹失灵（吴振东等，2022），时间银行参与者的社会特征表现为志愿者中女性占据优势地位等。以往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根据2013年全国居家养老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更愿意参与时间银行（丁志宏等，2018），在年轻人中，女性大学生对时间银行的参与意愿也较男性高（印荷杨等，2019）。

在现实层面，讨论时间银行志愿者的社会特征有利于促进时间银行在第三次分配中扩大社会资源供给。在学术研究层面，以往学术界对时间银行参与者的研究中，性别大多数时候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出现，存在着性别视角的缺失。鲜见的以女性主义视角讨论女性学术时间银行的是威尔逊-托马斯（Wilson-Thomas, 2021），他认为时间银行重新定义工作和金钱这一目标与一些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时间积分让人觉得参与时间银行就是工作，但时间银行没有重新定义工作和价值，相反，它重申了带薪劳动的价值。时间银行作为一种手段，以社会资本的价值为幌子，将人们置于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规训之下，以影子工作换取影子工资。科洛姆（Collom, 2011）也在研究中讨论过时间银行参与的性别差异，他认为，首先，时间银行中的女性参与者远多于男性，是因为女性在非正式、非市场劳动中经验丰富，而在正式的经济活动中她们的劳动被贬值，时间银行为她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其次，女性在美国比男性更可能成为志愿者，而时间银行参与者的招募又存在

熟人关系的模式。目前国内对时间银行参与者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是没有性别差异的参与者。但在现实中，男女两性对志愿服务的需求与贡献是有差异的，在时间银行的参与中可能就体现为不同性别参与者的占比、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的差异。

基于学术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需求，本文结合“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数据和田野调查结果，说明我国时间银行中女性志愿者占优势地位，并解释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为改善时间银行中的人力资源配置提供政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资料收集及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我国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性别结构及其成因。

在定量研究部分，本文使用了“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数据。2021年8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实施了“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该调查分别面向全国范围内的时间银行机构负责人、志愿者和服务对象发放了问卷。问卷进行了电子化处理，采用电子问卷（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经统一培训后，分小组展开各地区的线上调查，采取点对点发放回收，通过电话指导等形式确保回收问卷的质量，对于缺失值较多的问卷，及时跟进，请求机构协助确认。本文主要使用的是“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中的机构问卷和志愿者问卷回收所得数据，文中所涉及数据均使用SPSS软件加以分析。

为了解释定量数据所反映现实的背后原因，本研究选取了“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的调研对象之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时间银行SC，于2022年7月至9月期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者以

时间银行志愿者身份进行参与式观察，参与了该机构的多次志愿服务活动，并与1名机构负责人、1名机构所在社区居委会书记、20名时间银行志愿者，共计22人进行了访谈，形成约3.2万字田野笔记、40余万字访谈录音整理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提及的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研究使用NVivo 12软件对访谈稿逐字进行整理和分析，采用归纳法从下至上将数据进行浓缩和提炼。首先，从原始文本中筛选出有意义的字词、语句或段落，找出内容或逻辑相近的数据，形成诸如“社区工作”“低技能”“跟人接触”“发挥党员作用”等范畴，此即一级编码。随后，采用更具概括性的标题如“时间银行的熟人社会倾向”“时间银行与女性的职业想象”“作为社会参与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构建二级编码，并依据主范畴形成文本。最终，在对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三级编码的核心范畴“外部环境”“文化观念”“个体需求”。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女性志愿者在我国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分别是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的参与程度、参与方式和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度，以体现两性在参与意愿、参与满意度以及未来参与此类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方面的差异，即两性在时间银行志愿服务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

假设1：女性志愿者比男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的参与程度更高。

志愿服务的性别差异除了体现在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参与志愿服务这一方面，还体现为女性志愿者比男性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参与程度（volunteer intensity）更深（Mesch et al., 2006; Rosenthal et al., 1998; Wymer Jr & Samu, 2002）。以往研究在测量志愿服务参与程度时一般用志愿者的志愿服务频率和参与志愿服务组织的数量来表示（Mesch et al., 2006; Wymer Jr & Samu, 2002）。在时间银行会员的参与程度测量上，一些国外学者用交易频率，包括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频率，来衡量时间银行会员的参与程度（Mowday, 1979）。由于目前我国时间银行仍处于发展初期，各地时间银行的积分兑换

政策没有统一,一些时间银行采取定期强制兑换政策,一些时间银行则暂时不支持积分兑换,故积分兑换频率不能用来说明时间银行志愿者的参与程度。考虑到数据限制和我国时间银行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志愿者提供服务的频率说明志愿者的参与程度,服务频率越高,表明志愿者在时间银行的参与程度越高。

假设 2: 不同性别志愿者时间银行的参与方式不同。

本研究将志愿者参与时间银行的方式操作化为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往的志愿服务研究认为,不同性别的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活动类型存在不同的偏好,如男性更热衷于参加休闲和专业类志愿活动;女性更乐于参加促进人类发展和宗教类志愿活动(Themudo, 2009),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偏爱政治类志愿服务(Rosenthal et al., 1998)。还有研究从性别隔离角度分析两性的志愿服务参与,认为男性在志愿服务组织中更倾向于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和教育指导类的工作,而女性志愿者则更多从事筹款、准备食物或衣服等工作(Rotolo & Wilson, 2007)。国外时间银行研究也认为,女性志愿者与男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Collom, 2011),本研究将尝试分析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属实。

假设 3: 女性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度更高。

以往研究表明,志愿服务的性别差异还体现为对志愿服务的投入程度不同(commitment)(Lammers, 1991)。国外有研究使用量表测量时间银行会员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度,结果显示,女性会员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度更高(Collom, 2011)。组织承诺度分别从认同、行为和期待三个方面展示了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具体来说,组织承诺度说明了个体是否坚信组织目标、认同并接受组织价值观;是否自动自发地为组织竭尽全力;是否渴望在该组织中一直工作下去(宋爱红、蔡永红, 2005)。本研究采用“组织承诺量表”(OCQ,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Mowday, 1979)测量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态度。本研究将 OCQ 中的“组织”替换为“时间银行”,具体内容包括“我愿意付出比常人多的努力,来帮助这个时间银行继续存在”“我会向社区邻居、朋友们推荐这个时间银行”“我觉得我和这个时间银

行的价值观很接近”“我为自己是该时间银行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这个时间银行让我在志愿服务中有出色表现”“我很高兴成为时间银行的志愿者，而非其他志愿者组织”“我关心这个时间银行的发展”“对我来说，加入这个时间银行是参加志愿服务最好的选择”等 8 道题目。本研究将使用此量表验证中国时间银行的志愿者组织承诺度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二、女性在我国时间银行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我国时间银行志愿者的人口学特征

根据“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志愿者问卷结果，本次调查的志愿者来自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 个市、38 家时间银行。共有 230 名时间银行志愿者参与了调查，受访时间银行志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 46 岁。其中，男性志愿者平均年龄为 44 岁，女性志愿者平均年龄为 46 岁。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志愿者为多数，占到总数的 75.65%（174 名）。个人年收入水平方面，年收入在 5000 元及以下的志愿者最多，占到总数的 32.61%（75 名），年收入 10001—50000 元者占 24.35%（56 名），年收入介于 50001—100000 元者占 18.70%（43 名）。从教育水平上看，专科学历的志愿者最多，占 26.96%（62 名），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志愿者和全日制本科学历的志愿者，分别占 19.57%（45 名）和 19.13%（44 名）。从政治身份上看，群众占样本总体的 70%（163 名），共产党员占到 25.65%（59 名）。从户籍上看，来自城市的志愿者较多，占 80%（184 名）。

从性别结构上看，“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志愿者问卷结果显示，女性志愿者占 69.57%（160 名），而男性志愿者仅占 30.43%（70 名），女性志愿者的数量更多，占比更高。为了验证这一性别比例，本研究还参考了“时间银行发展状况第四轮全国调研”机构问卷，并将问卷中对各个机构提供的两性志愿者数量进行加总，发现女性志愿者占比 64.88%（199982 名），

男性志愿者占比 35.12% (108690 名), 女性志愿者从数量和比例上看仍占据优势地位。

(二) 性别结构影响参与程度

不同性别的志愿者参与时间银行的年限存在显著差异 ($F=6.270$, $P=0.013$), 其中女性志愿者参与时间银行的平均年限更长, 为 6.30 年, 男性志愿者参与时间银行的平均年限为 6.08 年。参与年限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忠诚度, 即女性志愿者对所在时间银行的忠诚度更高。但志愿者的参与年限还与我国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有关 (刘建军、张兰, 2019), 由于社区是典型的女性化空间, 植根于社区的时间银行在发展初期无疑会受此影响而使女性志愿者具有数量和参与年限上的优势。因此, 参与年限无法说明两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活跃程度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在参考志愿者平均参与年限外, 还引入了志愿者服务频率的概念, 以此衡量不同性别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活跃程度差异。

本研究将志愿者服务频率操作化为志愿者自加入时间银行以来每月提供服务的小时数, 用“已存储时长”/ ($12 * \text{“参与年限”}$) 计算, 单位为小时 / 月。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对男性、女性志愿者提供服务频率进行比较。男性、女性志愿者在服务频率上的秩平均值分别为 97.52 小时 / 月和 123.97 小时 / 月, 差异显著 (MannWhitney $U=4341.500$, $p=0.007$)。可以说明, 受访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提供服务的频率比男性志愿者更高, 即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活跃程度更高。

(三) 性别结构影响参与方式

在我国的时间银行全国调查中发现, 男性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频率最高的是助浴服务, 其次为老年人托养服务和助餐服务; 女性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频率最高的是老年人托养服务, 其次为助行服务和社区公益服务。可以看

女性何以占领时间银行：我国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出，男性志愿者提供频率最高的三项服务中有两项服务——助浴服务和助餐服务涉及体力劳动。

表 1 不同性别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频率比较（次/月）

志愿服务	男	女
助餐服务	2.07	2.15
助医服务	1.81	1.95
助洁服务	1.89	2.00
助浴服务	2.31	2.06
助行服务	2.04	2.22
老年人托养服务	2.23	2.47
慈善捐助服务	1.56	1.34
社区公益活动	1.79	2.21

此外，不同性别志愿者在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参与频率更高（2次及以上）。

表 2 不同性别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频率比较（n=230）

志愿服务类型	服务提供频率 (次/月)	男	女	卡方值	P 值
助餐服务	0	40(57.14)	106(66.25)	2.126	0.547
	1	10(14.29)	17(10.63)		
	2	8(11.43)	12(7.50)		
	3 及以上	12(17.14)	25(15.63)		
助医服务	0	38(54.29)	86(53.75)	2.135	0.545
	1	14(20.00)	22(13.75)		
	2	10(14.29)	32(20.00)		
	3 及以上	8(11.43)	20(12.50)		
助洁服务	0	35(50.00)	96(60.00)	2.424	0.489
	1	15(21.43)	24(15.00)		
	2	9(12.86)	16(10.00)		
	3 及以上	11(15.71)	24(15.00)		

续表 2

志愿服务类型	服务提供频率 (次/月)	男	女	卡方值	P 值
助浴服务	0	57 (81.43)	142 (88.75)	4.651	0.199
	1	2 (2.86)	3 (1.88)		
	2	5 (7.14)	11 (6.88)		
	3 及以上	6 (8.57)	4 (2.50)		
助行服务	0	44 (62.86)	93 (58.13)	1.601	0.659
	1	10 (14.29)	18 (11.25)		
	2	5 (7.14)	16 (10.00)		
	3 及以上	11 (15.71)	33 (20.63)		
老年人托养服务	0	44 (62.86)	115 (71.88)	5.644	0.130
	1	7 (10.00)	10 (6.25)		
	2	6 (8.57)	4 (2.50)		
	3 及以上	13 (18.57)	32 (19.38)		
慈善捐助服务	0	61 (87.14)	131 (81.88)	1.751	0.626
	1	5 (7.14)	21 (13.13)		
	2	3 (4.29)	6 (3.75)		
	3 及以上	1 (1.43)	2 (1.25)		
社区公益活动	0	27 (38.57)	47 (29.38)	9.425	0.024*
	1	23 (32.86)	33 (20.63)		
	2	6 (8.57)	23 (14.37)		
	3 及以上	14 (20.00)	57 (35.63)		

注：* $P < 0.05$ ，表明变量在 0.05 水平上显著。

社区公益活动指的是以社区为服务对象开展的社区志愿活动，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北京的时间银行志愿者所从事的社区公益活动通常包括垃圾分类、社区卡口值班、疫情防控等。

(四) 性别结构影响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

问卷应用 OCQ，将“非常不同意”赋值为 1，“非常同意”赋值为 5。男

性志愿者组织承诺得分平均为 4.25，女性志愿者平均为 4.12，不同性别的时间银行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情况无显著差异（ $F=0.305$ ， $P=0.581$ ）。组织承诺度是成员对组织认同和信任的体现，两性志愿者在组织承诺度方面没有显著区别可能与我国时间银行正处于发展初期有关。首先，目前我国很多时间银行仍在生存边缘挣扎，志愿者认为组织的未来发展是不明朗的。其次，很多时间银行没有脱离志愿服务组织的影子，且缺乏组织文化建设，志愿者没有将所在时间银行与其他志愿服务组织区分开，故很难形成对时间银行的组织认同。

综上所述，女性志愿者在我国时间银行中占优势地位，具体体现为女性志愿者的数量和占比多于男性志愿者，女性志愿者的时间银行参与程度比男性更高。此外，女性志愿者和男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倾向于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女性在时间银行中比男性更可能提供社区公益服务。

三、从工作到生活：女性志愿者何以占领时间银行

那么，女性志愿者何以在时间银行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往研究常用社会角色理论解释女性的助人行为（Gil-Lacruz et al., 2019）。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艾丽斯·伊格利（Eagly, 2013）将性别角色定义为对社会所认同的性别行为的共同期望，认为两性的行为差异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与其性别角色和个人经历一致的行为。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可以从助人行为的性别倾向、职业发展补偿和挑战公共领域的男性主导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一）时间银行与社区志愿服务

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植根于社区（王玥、毛佳欣，2022），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是时间银行和社区志愿服务紧密结合的体现。以往研究发现，男性更关注强调权力、能力和权威的角色，而女性则更关注强调

人际互动和社会支持的角色，这一行为模式差异在代际和社会间传播，创造了对性别行为的期待，使得女性角色通常与“社区”“照顾”“朋友”“家人”等关键词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在中国的志愿服务研究和社区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在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中，女性是主要的管理者和服务者（焦若水，2017）。以女性为主导的社区工作抑制了男性对社区事务的参与（陈文，2010），社区工作呈现性别化倾向。当研究者问到为什么参加时间银行时，李阿姨做了如下回应：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从来不介入街道工作的人，我觉得我要是进入这个环境以后，我就是像人说的“老太太”。其实我岁数就应该是老太太，但是我自己就不喜欢这个环境，我就觉得老是家长里短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挺抵触的。但是就是慢慢地，老跟他们在一块，然后他们总是挺努力的，搞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经组织，起码我介入了以后，我们家孩子不会说我什么。之后我就加入了。（李阿姨，2022年7月22日）

李阿姨将“街道工作”与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混淆，还体现为李阿姨认为自己进入时间银行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与李阿姨相比，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对队长侯阿姨来说顺手拈来，因为她在社区居委会做了五六年的支委，对社区工作的逻辑非常熟悉。在李阿姨看来，街道工作充斥着家长里短，是老年女性应该从事的工作。女性与社区的联系确实更为紧密。在社会空间层面，社区在治理逻辑、社区营造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是典型的“女性化空间”；在个体层面，女性被认为与社区的“心理联结”更加紧密（沈蓓绯，2011）；在社区层面，社区的社会资本也呈现出性别化积累（刘建军、张兰，2019）的现象。

我国时间银行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志愿服务的发展存在深度绑定的关系。早期时间银行吸纳的志愿者多来自志愿服务组织，而在大多数志愿服务组织中，女性志愿者是多于男性志愿者的（郭夏娟，2011）。社区 SC 时间银

行的负责人李如此解释机构志愿者的性别失衡：

参与到志愿服务里的这些叔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觉得只是缺少一个机会，比如说可能他正好认识我们的志愿者、认识某个人，我们志愿者动员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今天我去张大妈家遛个弯，你跟我去一趟，你跟我去过两三回，注册时间银行给你积分，你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久而久之就参与进来。首先他得认识这个东西，然后再去跟它接触一下，慢慢就觉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我跟你去一次，人家说声谢谢，就觉得心里满足。（SC 时间银行负责人李，2022 年 7 月 18 日）

李提到，男性志愿者少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机会接触时间银行，这与美国时间银行的情况类似。已有研究认为，女性在美国比男性更可能成为志愿者，而时间银行参与者的招募又存在熟人关系的模式（Collom, 2011），故无论是时间银行还是其他志愿服务组织，男性都比女性更难加入。

（二）时间银行与女性的职业想象

然而，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不仅体现在数量和占比上，还体现在对时间银行的参与程度和服务内容的独特性上。严格意义上来说，时间银行不等于志愿服务，而是一种基于服务供需匹配的双向互助行动，改变了过去的单向受助者模式（陈功等，2021）。时间银行中的女性在非正式的、非市场劳动中经验丰富，而在正式的经济活动中她们的劳动贬值，时间银行为她们提供了更多机会（Collom, 2011）。时间银行志愿者李阿姨在描述志愿者职业构成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现在能够进入社区工作的人，99% 基本属于科级以下，其实都是普通人。曾经在单位做过处长、局长的，职位更高一点的或者是高知什么的，这些人（在志愿者队伍中）也有，但是特别少……你跟人家就不是一个层次了……你

说话都跟人家说不到一个点，你只有跟比较接近的人才能说到一起。（李阿姨，2022年7月22日）

李阿姨认为，时间银行志愿者队伍主要由社会阶层较低的“普通人”组成。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工作技能不断提高，但受社会偏见的影响无法晋升至更高的管理岗位，面临职业天花板的困境（Haas & Gregory Jr, 2005），因此高社会评价、高工作自主权和低技能要求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成为女性追求职业发展的良好选择。在时间银行的运行机制中，以时间为交换单位用服务换服务，某种程度上符合志愿者对有偿工作的想象。在威尔逊-托马斯的研究中，很多时间银行的参与者是无法找到有偿工作的女性新移民，这些女性成员通过做一些“类似工作”的事情表达对时间银行的尊重，以填补自己因无法获得有偿工作的价值感缺失（Wilson-Thomas, 2021）。因此，时间银行中女性成为主力。

此外，女性在时间银行中提供了独特的服务内容，如前所述，相比于男性，她们更加热衷于社区公益服务。北京市东城区某时间银行的一支志愿者队伍名为“绿色家园党员先锋志愿队”，由6名低龄老人志愿者组成，包括5名女性和1名男性。该志愿者队伍的建队初衷是建立和维护所在社区的小花园，之后也在社区从事一些与为老服务相关的志愿服务。据志愿者队长侯阿姨介绍，起初队伍只有5名女性志愿者，她们都曾在该社区从事志愿服务多年。2020年，5名志愿者在社区的支持下开发了一片空地，从社区居民和爱心商户那里募集了工具和种子，每周两次在小花园播种、浇水、除草、捡拾垃圾。两年来，小花园已初具规模，成为社区居民赏花和休息的好去处。人类学家奥特纳（Ortner, 1972）在其研究中提出过一个这样的著名论述：在人类二元对立的符号系统当中，男性接近文化的一端，而女性接近自然。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的文化表述中，存在着“自然—文明”这样的两极，女性总是与有着自然的、天然的、原始的、生殖的意涵的符号联系起来，而男性往往会被联系到文化、科技、文明、知识、政治这样的领域。社区花园作为自然和天然的象征，常常与女性“孕育者”“照顾者”的形象联系起来，“绿

色家园党员先锋志愿队”成立初期就吸引了5位女性志愿者加入，杨阿姨如此描述队里唯一的男性刘叔叔加入的动机：

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这帮女同志天天在一块儿……他看到我们是真想把这件事做成。（杨阿姨，2022年8月16日）

据志愿者队长侯阿姨介绍，刘叔叔起初拒绝加入她们，直到一年后刘叔叔看到社区花园逐渐成形，才加入了她们。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女性在社会中有三重角色：一是再生产者，负责生养孩子、照顾老人、开展家务劳动等；二是生产者，指女性参加职业劳动；三是社区责任者，处理家庭与外部社会的事务、担负社区责任。而男性通常只被认为承担生产者的角色（王小波、谭琳，2007）。我国的研究也证实女性与社区的心理联系相比男性更为紧密（夏辛萍，2018）。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女性在中国城市建设与社区安全建构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针对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服务，女性还是社区卫生服务、社区文化建设和社区治安等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郭夏娟，2011）。

（三）作为社会参与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

从女性个体的参与动机来看，志愿服务作为女性志愿者亲社会行为的互动出口，挑战了男性在公共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她们对生活的掌控感增强，也就是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赋权。一个生活领域中基于性别的期望和行为会延续到另一个生活领域，基于性别规范的期望会扩展到工作环境当中，工作场所的“有序和愉快”体验可以为女性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动机和机会”。在访谈中，几位志愿者谈到了自己参与时间银行的动机：

大伙儿见一下在一块儿玩，还乐呵乐呵，挺好的，主要还是咱们是发挥党员作用。（侯阿姨，2022年7月22日）

岁数越来越大了，还是要跟人接触对吧，要不然的话你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窄。（穆阿姨，2022年8月8日）

个人互动是女性心理发展的重要基础。志愿者侯阿姨和穆阿姨提到她们个人的参与动机时说，社会互动和作为党员应发挥的社会作用是主要因素。的确，参与志愿活动有益于加强社会互动，志愿者、活动组织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更多元的互动网络，女性志愿者通过社会参与获得了信心，并赋予了其他女性权力，实现了女性间相互赋权（Kulik & Megidna, 2011）。

四、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认为，总体上来看，女性志愿者在我国时间银行中占有优势地位，分别体现为女性志愿者的数量和占比多于男性志愿者，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的参与程度比男性更高。女性志愿者和男性志愿者倾向于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尤其体现在女性更倾向于提供社区公益服务。但女性志愿者和男性志愿者对时间银行的组织承诺度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我国时间银行处于发展初期有关。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可以从助人行为的性别倾向、职业发展补偿和挑战公共领域的男性主导三个方面得到解释。首先，时间银行与基层社区工作的深度绑定使得时间银行囿于熟人社会中，女性在基层工作中的优势地位传递到了时间银行领域；其次，在社会文化观念里，女性被认为是低技能工作的从事者和天然的社区照顾者，时间银行志愿者与女性在传统社会文化观念中的角色不谋而合；最后，参与时间银行作为社会参与的一种，满足了女性个体的发展性需求，是女性迈向公共领域的体现。可以说，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即外部环境、文化观念和个体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可能不利于时间银行的发展。首

先，女性志愿者比男性更易产生非正式助人行为，而非正式助人行为可能会影响时间银行的良性发展，因为女性具有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和利他主义的特点，并且她们通常有更多的非正式助人行为（Gallagher, 1994）。SC 时间银行的另一位女性志愿者芳芳阿姨是该组织的“明星志愿者”，她因腰部受伤成为残障人士，后天致残的经历让她特别关注残障群体，并在时间银行以志愿者的身份提供手工编织教学和陪读服务，帮助患有小儿麻痹和脑萎缩的残障老年人学习手工编织、陪视障老年人参加诗朗诵活动，丰富残障老年人的生活。这位残障女性志愿者与她帮助的残障服务对象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非正式的帮助行为逐渐取代了很多通过时间银行实现的正式服务。长此以往，如何在保持时间银行会员黏性的同时约束志愿者的非正式助人行为，是时间银行作为志愿服务新模式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其次，时间银行可能会因为缺少男性志愿者而缺乏某些特定服务（Collom, 2011），从而影响时间银行的健康发展。根据已有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女性志愿者在时间银行中倾向于提供和男性志愿者不同的服务，尤其是在社区公益活动方面，女性志愿者比男性更容易加入此类活动。然而，女性在时间银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会影响男性志愿者加入时间银行，从而导致特定服务的缺乏我们还不得而知，未来需要更多研究做进一步验证。

从前述对我国时间银行志愿者的构成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志愿者在数量比例和参与程度上存在明显优势，这与当前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的现状较为一致。种种迹象表明，时间银行仍未能摆脱志愿服务组织的深刻影响。首先，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时间银行的发展，应规范时间银行的存兑机制，加快实现全国时间银行通存通兑，尽快提高时间银行的规范程度。其次，我国应在政策上倡导和鼓励时间银行独立发展，逐步减少时间银行对基层政府的资源依赖、政策依赖，使时间银行的发展植根于社区，但不局限于社区。最后，要扩充时间银行服务内容的类型，着力发展技能交换类、兴趣爱好类服务内容，提高时间银行对男性志愿者的吸引力，提高男性的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 [1] 陈功、李娜、王黎、索浩宇, 2021,《时间银行 健康储蓄的新方式》,《中国卫生》第11期。
- [2] 陈文, 2010,《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3] 丁志宏、杜书然、裴臻, 2018,《城市退休健康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人口与社会》第2期。
- [4] 郭夏娟, 2011年,《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5] 焦若水, 2017,《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区治理》,《探索》第1期。
- [6] 刘建军、张兰, 2019,《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7] 沈蓓绯, 2011,《社区志愿服务:女性社会角色建构的有效路径》,《广西社会科学》第5期。
- [8] 宋爱红、蔡永红, 2005,《教师组织承诺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第2期。
- [9] 王小波、谭琳, 2007,《社会发展中的社区与女性》,《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10] 王玥、毛佳欣, 2022,《“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实现路径——以“五社联动”社区创新治理为背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1] 吴振东、汪洋、陈功, 2022,《时间银行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路径挑战及优化》,《理论月刊》第8期。
- [12] 夏辛萍, 2018,《退休女性社区志愿服务角色转换和社会参与》,《中国老年学杂志》第2期。
- [13] 印荷杨、陆方、黄琦程, 2019,《基于大学生视角的“时间银行”养老志愿服务意愿与影响因素》,《中国老年学杂志》第3期。
- [14] Collom, E. 2011, “Motiva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a Community Currency System: The Dynamics within a Loc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Sociological Forum* 26(1).
- [15] Eagly, A. H. 2013,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Psychology Press.
- [16] Gallagher, S. K. 1994, “Doing Their Share: Comparing Patterns of Help Given by

- Older and Younger Adul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6(3).
- [17] Gil-Lacruz, A. I. Marcuello, C. Saz-Gil, M. I. 2019, “Gender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Volunteer Rates,”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8(2).
- [18] Haas, A. Gregory, JR. S. W. 2005, “The Impact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Interactional Power,” *Sociological Forum* 20(3).
- [19] Kulik, L. Megidna, H. 2011, “Women Empower Women: Volunteers and Their Clients in Community Servi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9(8).
- [20] Lammers, J. C. 1991, “Attitudes, Motives and 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Volunteer Commitment and Service Duration,”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14(3-4).
- [21] Mesch, D. J. Rooney, P. M. Steinberg, K. S. et al. 2006, “The Effects of Rac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Indian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5(4).
- [22] Mowday, R. T. 1979,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4(2).
- [23] Ortner, S. B. 1972,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Feminist Studies* 1(2).
- [24] Rosenthal, S. Feiring, C. Lewis, M. 1998, “Political Volunteering from Late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Patterns and Predicto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4(3).
- [25] Rotolo, T. Wilson, J. 2007, “Sex Segregation in Volunteer Work,”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8(3).
- [26] Themudo, N. S. 2009, “Gender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8(4).
- [27] Wilson-Thomas, J. 2021, “Time’s up: Analyzing the Feminist Potential of Time Banks,”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28(6).
- [28] Wymer, JR. W. Samu, S. 2002, “Volunteer Service as Symbolic Consumption: Gender and Occupational Differences in Volunteer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8(9-10).

(责任编辑：田 丰)

based voluntary service initiated by public administrative forc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welfare provision channel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social members and a social governance platform to promote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roject-based youth voluntary service as a governance arrange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wo representative youth volunteer service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ory. Centering on the analytical logic of “governance subject-governance path-governance object-governance resul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mechanism of how project-based voluntary service participates in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oject-based implementation mode of providing normalized and large-scale voluntary service talents and resources to underdeveloped areas by relying on “state support, department consultation, Communist Youth League undertak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ocialized operation” is a way to stimulate social vitality from top to bottom by the state, and also a governance tool serving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Empowerment and transfer space are not the purpose, but to stimulat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voluntary service as a governance means, and promote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y Women Dominate: Gender Difference in Chinese Time Banks

..... *Xiong Yiyi, Wang Li & Chen Gong* 100

Abstract: Gender difference is an important social characteristic of time bank volunteers, reflecting the supply of social resources i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his study applies a mixed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30 time bank volunteers in China and interviews with 22 relevant personnel from a time bank in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female volunteers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ime banks in China,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female volunteers are more than male volunteers, and the engagement of female volunteers in time bank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In addition, female and male volunteers tend to provide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in time banks, and women are more likely than men

to provide community services in time bank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time bank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aspec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lping behavior, compensatory effects i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ing the male dominance in public spher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 *Jiang He, Tong Xiaonan, Lv Xiaokang & Wang Xinjian* 118

Abstract: Volunteers' self-efficac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otivator that predicts their service eng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is study developed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and validated its measurement properties. We first compiled 24 item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volunteers from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service teams, and previou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cales of self-efficacy. These items cover volunteers' cogni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emotional feelings during the volunteer service process, and specific voluntary service competence behaviors. Subsequently, we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se 24 items to form a formal scale. After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 one-dimensional, 14-item formal scale wa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tool we developed, a retest with a group of was we conducted. We selected the "ZHIYUANHUI" app for sample collection. The results of retesting 1042 registered volunteers showed that the scale has adequat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structure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which proves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has good measurability propertie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scale we developed can serve as a good measurement tool for measuring volunteer self-efficacy in China.

“Honoring Idols” and “Ideal Sel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Zhang Dong & Fan Qin 134

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growth of fan subculture, it has had a